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译注 刘玉才

审阅 倪其心

吴越春秋选译

吳越春秋選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罗二虎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吴越春秋选译

刘玉才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 140 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第二批50种)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列强争霸的时代。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越国，本来是两个落后的诸侯国，僻居东南一隅，被中原各国鄙视为“蛮夷之邦”。但春秋中叶以后，吴、越两国相继崛起，凭借强盛的军事力量，东征西讨，问鼎中原，一度跻身霸强之列。《吴越春秋》记叙的就是吴国、越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吴、越两国争霸之事。

《吴越春秋》的撰者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赵晔因耻于做一个侍奉别人的县吏，遂不远数千里，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从著名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经籍，长达二十年。家里人都以为

他死了，曾为他举办丧事。赵晔的生卒年已不可考。他曾从杜抚学《韩诗》，而《后汉书》载杜抚“建初中（公元76—83年）为公车令，数月卒”。据此推知，赵晔大约生活在公元一世纪中期到二世纪初期。赵晔除《吴越春秋》外，还撰有《韩诗谱》二卷，《诗细历神渊》一卷，《诗道微》十一卷。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到会稽，看过《诗细历神渊》后，大为赞赏，认为其水平高于王充的《论衡》^①。可惜以上三书均已佚，只有《吴越春秋》传了下来。

现在传世的《吴越春秋》共十卷，前五卷记载吴国自太伯至夫差之事，称内传；后五卷记载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之事，称外传。书中记事采用纪传体，依吴、越两国诸王各自为传，传中以年系事。从形式方面看，编排系统明确，叙次分明。但是其内容，多以《史记》、《国语》、《左传》三书为据，属于“抄撮古史的著作”，史料价值并不很高。此外，《吴越春秋》中还夹杂了许多民间传说、神异故事。因为吴越争霸是春秋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改变了整个中原的形势，故有关吴、越两国的故事，史家乐于称道，在民间也广泛流传。流传的过

^①见《后汉书·儒林传》。

程，同时也是重塑的过程，许多传说故事、想象之辞被附会到吴越历史里。于是伍子胥不仅是兵家、谋臣，而且上识“天气之数”，下善“因地制宜”，还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以神机妙算战胜敌人（《阖闾内传》）。范蠡在越国，卜日占时，“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辅佐越王谋取霸王之位（《勾践归国外传》）。公孙胜“多见博观，知鬼神之情状”，夫差因为不相信他的卜梦之谏，以至于败亡（《夫差内传》）。其它如干将、莫邪铸剑，吴人作钩，越女论剑，陈音论弩，也多神异、怪诞之谈，近似小说家言。

《吴越春秋》过去一直被列入杂史类，清代修《四库全书》，认为此书“近小说家言，自是汉晋稗官杂记之体”，才归入小说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未将此书正式划归小说类，但已说它“本史实”而“含异闻”，属于“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我们认为，《吴越春秋》的性质介于史书与小说之间，它既讲述古史，又附会民间传说，有点类似于后世的历史演义，或者可以称作历史演义小说。

我们说《吴越春秋》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并不表明它在史料价值上一无足取。《吴越春秋》在记事方面仍有其独到之处，它补充了正史的一些遗

漏。赵晔是越地人，后汉又去古未远，有关吴越相争的文献材料、口头传说当了解得比较多，因而书中记事较《史记》、《国语》等书要丰富。如《阖闾内传》载伯翳自楚入吴，是伍子胥介绍的，这在当时的情势下，非常可能，但其它各书都没有记载。再如孙武担任吴国将领，率兵讨伐楚国之事，《吴越春秋》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而《史记》等书的记载都很简略。

《吴越春秋》作为古史与民间传说混杂的历史演义小说，比较偏重于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述，而不太注意史料的真实与准确，加之叙事过分蔓延，致使纰缪层见迭出。如书中记楚灵王三次伐吴、越国灭吴等历史事件的年代，都与《史记》、《左传》的记载无法吻合，不知依据何在。另外，许多地名不见史书记载，而且无法弄清楚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有些历史人物，关系颠倒。如楚国大夫卻宛是太宰伯州犁的儿子，但本书《阖闾内传》却说：“白（伯）州犁，楚之左尹，号曰郤（卻）宛。”竟把父子混为一人。又如阖闾与夫差的关系，吴王僚与吴公子盖馀、烛庸的关系，也前后矛盾。至于在引用古书时，字句解释方面的错误也屡见不鲜。如《国语·越语上》说：“（今寡人）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命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

妻。”“蕃”当作“蕃息”解。但是本书《勾践伐吴外传》引用此文，却讹为“将率二三子夫妇以为藩辅”，把“蕃息”或“蕃殖”之“蕃”，误解为“藩辅”之“藩”。正因为《吴越春秋》存在诸多错讹，陈中凡先生遂推断不可能出自治《韩诗》达二十年之久的赵晔之手^①，虽非定论，可备一说。

《吴越春秋》虽存在许多史实错讹。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吴越春秋》无论是刻划人物、描述情节，还是渲染气氛，铺排场面，都不乏精采之笔。其行文骈散间出，杂以诗歌谣谚，语言相当丰富。

《四库总目提要》认为它“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评价较为公允。《吴越春秋》总共塑造了近百个历史人物，有许多人物刻划得很有力度，很有生气，其中尤以伍子胥的形象最为突出。伍子胥是先秦时代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壮烈的复仇故事，《左传》、《国语》都有记载，但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史记》最早为伍子胥立传，称赞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一位“烈丈夫”。

《吴越春秋》以《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为基础，又综合了秦汉以来的民间传说，使得伍子胥故事的内容更为丰富，伍子胥的形象更为完

^①陈中凡《论〈吴越春秋〉为汉晋间说部及其在艺术上的成就》，载于《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

整。书中的伍子胥，不为封建道德所羁绊，毅然离开自己出生的楚国，饱尝艰辛困苦，为父兄复仇，又不计个人厉害，忠言直谏，以报效替他复仇的吴国，虽至杀身在所不辞。为了家族与民族的恩怨与荣誉，不惜贡献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英雄形象，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的。至于说伍子胥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那是历史人物时代的局限，我们无须对书的作者求全责备。伍子胥在封建社会是深受崇拜的人物，许多地方有祭祀他的宙宇，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对此《吴越春秋》的塑造应该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吴越春秋》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历史故事，特别注重情节的安排，场景的铺陈，而且时常夹杂一些传说故事，使得内容生动、形象，很容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书中描述的许多故事，如伍子胥的故事，勾践的故事，范蠡的故事，干将、莫邪的故事，等等，都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吴越春秋》在古代还被改编成其它一些文学形式。唐代俗讲中，有《伍子胥变文》四卷，即是将本书上卷改编为讲唱文学。宋元话本有《吴越春秋连像平话》，是根据本书改编的说话人的底本。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是根据本书改编的传奇剧。由此可见，《吴越春秋》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

世各代艺人以《吴越春秋》为祖本，用各种文艺形式把它表现在讲坛或舞台上，使古代民族典型人物永远保存在后世人民的记忆中。

《吴越春秋》虽然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但它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意义。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周王朝土崩瓦解，诸侯各国凭借军事实力相互吞并，弱肉强食。楚国是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国，它不断向外扩张，欺凌周围的弱小国家。由于长年穷兵黩武，导致国内矛盾激烈，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楚平王时（公元前528—515年），伍子胥、伯嚭相继出亡，利用敌国的力量击溃了楚国腐朽政权。吴国是长江下游新兴的国家，吴王阖闾统治时期，政治开明，经济有所发展，军事实力增强。阖闾在伍子胥、伯嚭、孙武等人辅佐下，一举击败了强大的楚国。但是阖闾的继任者夫差，刚愎自用，对外穷兵黩武，四处征讨，致使士兵疲惫，诸侯怨恨；对内杀掉了直言直谏的伍子胥、公孙胜，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最后落得个国破身亡的下场。越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是一个受吴人欺凌的国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志，发动广大民众为维护国家的尊严而战斗，最后消灭了吴国，取得了吴越战争的胜利。通过楚、吴、越三国的盛衰败亡，揭示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对

外扩张侵略，必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最后走上失败；而为捍卫国家尊严进行的防御战争，必定会得到国民的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在前边已经讲到，《吴越春秋》是古史与民间传说的混合物，它记载了许多占验之术和神怪之谈。如全书有多处伍子胥、范蠡卜日占时、预测吉凶的内容。《夫差内传》记夫差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而且梦中的事后来都得到了验证。另记越军伐吴，伍子胥显相以阻越兵，后又托梦于范蠡、文种，示以进军之路。《勾践阴谋外传》载勾践访问剑戟之术，越“处女将北见王”，道逢袁公，“化为白猿”。凡此种种荒诞离奇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汉代迷信风尚的一种体现。但在今天看来，它是封建迷信和糟粕，这是我们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吴越春秋》，《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都作十二卷，《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则作十卷。元徐天祐注《吴越春秋》，认为今本“殆非全书”。因为《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里的话，而《索隐》认为今本里没有这些话。另外，《文选》注引季子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夷亭事，以及《水经注》所载数条越国史事，估计都引自《吴越春秋》，可

是今本里都没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还录有晋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晋书·杨方传》以为杨方“更撰《吴越春秋》”），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隋志作《吴越春秋》）十卷，《宋史·艺文志》则只录有皇甫遵注《吴越春秋》十卷，不录杨书。徐天祐引邯郸李氏《图书十志目》云：“杨方尝刊削晔所为书，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为之传注。”而《史记》注等所引《吴越春秋》佚文，可能是“杨方所已刊削而皇甫遵所未考正者”。明代钱福则推测，《吴越春秋》佚去的两卷内容可能是“西施入吴”和“范蠡去越”。杨方、皇甫遵二人的本子，今都已不存。

《吴越春秋》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元大德十年刊本。明刊本有弘治十四年邝璠刊本，万历十四年冯念祖刊本，都是据大德本翻刻而成。清代及近代的多种刊本，则是据大德本或明本翻刻而成，其中《汉魏丛书》本将原书十卷合为六卷，削去了序及音注。元大德本有徐天祐的序和音注，明弘治本书末还有“徐氏补注”一页。徐天祐的音注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和《左传》、《史记》相比照，考订异同；二是刊正疑讹；三是注释。徐注纠正了原书的许多失实及疑讹之处，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便利阅读。《四库总目提要》称其“旁核众说，不

徇本书，犹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遗意焉”。

本书选取《王僚使公子光传》、《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勾践入臣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六篇，加以译注。原文基本依据苗麓先生的校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版），部分地方根据近人的校勘成果及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校正，并在注解中作了说明。《吴越春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多有脱讹，而且缺乏系统整理，因此许多地方“文义犹有滞碍不可训知”。笔者在译注过程中，尽量采用直译方式，个别地方因有脱讹，直译文意难以连贯，则采用意译方式。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必定存在许多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注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于燕园静泊斋